

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实录

伤心千里江山，怨曲重招，断魂在否？……

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实录

伤心千里江山，怨曲重招，断魂在否？……

中国文人

非正常死亡

实录

图文版
第①辑

黄勇 / 著

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实录

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实录

光明日报出版社

黃勇 著

中國文人非正常死亡實錄

楊雄文題



图文版第①輯

光明日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实录. 第1辑/黄勇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3

ISBN 7-80145-787-0

I. 中… II. 黄… III. ①知识分子—人物研究—研究—中国—古代 ②知识分子—心理状态—研究—中国—古代
IV. 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0796 号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电话: 6308243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仰山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1092 1/16 印张 13 字数 198 千字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145-787-0/K

定价: 25.00 元

前 言

非正常死亡,顾名思义,是相对于正常死亡的死亡方式。在中国传统的表述上,和“非正常死亡”与“正常死亡”基本对应的是“横死”和“善终”。横死,指因自杀、被害或意外事故而死亡。善终,指因衰老而死亡,不是死于意外的灾祸。这样的定义是相当明确和清晰的。但是,换用“非正常”与“正常”这两个相当现代的说法,问题就不这么简单了。

正常的标准如何,非正常的尺度又怎样,恐怕是言人人殊,难得统一。比如,古代征战沙场的将士,以马革裹尸为荣,而大多数老百姓的看法却是:不论被之刀枪,还是箭下作鬼,都属于横死。一个不很古代的寓言讲道:渔人的祖、父都死在海上,尸骨无存,而渔人仍然出海不辍。一个安居于陆地的所谓智者对渔人的行为表示不解——明知出海会死,为什么还要自己找死?渔人反问:“你的祖、父死在哪里?”智者回答:“死在家中的床上。”渔人就慢悠悠地吐出一句:“既然如此,你又为什么还要每天上床去睡觉呢?”且不论二者孰智孰愚,这个故事显然提供给我们这样一个结论: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生活背景的人对何为正常死亡,看法是大不相同的。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的认识又是一致的——只要“死得其所”,所谓“瓦罐不离井上破,大将难免阵前亡”,这种死亡对他们来说就是正常的。

在无法达成统一的情况下,以多为胜是通常的选择。

如果仅作数量上的考较,占国民人数最多的广大农民千百年来不改的愿望——寿终正寝,入土为安,当是最为正常的死亡了。人之一生,能抗过七灾八难,活到耄耋之年,遵循油尽灯枯、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辞别人世,是不小的荣耀——不仅对死者本人,还泽及其家庭、子女。这一点,通过遍行民间的丧事中吊丧者对死者家属所说的那句宽慰之语“老先生(老太太)高寿,高寿了”,显示得一清二楚。死者的家属在失去亲人的悲伤中听到这句话也会油然而生出一份欣慰甚至兴奋的感觉——死者高寿而终的本身就证明这个家庭数世同堂,和睦幸福;再进一步,死者的子女孝顺贤德也正昭然可见——谁能想像一个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夫不贤妻不敬的家庭会提供活出高寿的环境?于是,主办者脸上有光,参与者心生艳羡,视此为“喜丧”,气氛热烈,生死两安。——可惜的是,能够“寿终正寝”的人太少太少了。尽管它是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正常死亡”,但极大的反差是,能享此“正常死亡”者恐怕在所有死亡者之中所占比例最小。尤其在现代人的眼里,因为疾病而死亡是不能算作“正常死亡”的,而在“横死”和“善终”之间,“病故”占有的分量无疑极重。由此而言,“非正常死亡”的范围就不得不大幅膨胀——除去“善终”这极为难得的一种,其余似乎尽可归属于“非正常死亡”。

在定义范围太过宽泛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对所定义之事的准确把握。所以,适当的限定是必需的。本书中所涉及的“非正常死亡”,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横死”之外,稍作延展,只取“病故”中因意外事故致病而亡的情况。

中国人对死亡问题的认识相当丰富和深刻。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论语》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路请教有关死亡的问题,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先进》篇)就是说,生的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怎么去了解死呢?老先生似答非答,给了后人丰富的想像空间。有人从中读出夫子重视现世人生的儒者风度,有人认为是老先生谦虚,自认为对死亡缺乏了解,所以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不予回答。种种说法,不一而足。而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集注此句曰:“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则必不能反终而知所以死”,并引“程子曰:昼夜者,死生之道,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死生之事,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所以,“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所以深告也。”可以说,朱子的

解释是千载之下得圣人真意的。既然死生之事“一而二，二而一”，知生可以知死，那么，反过来讲，知死亦可以知生。从古至今，人们对死亡投以极大极深的关注，无非是由死观生、由死向生的需要。

郑师晓江教授，专事哲学研究，曾主编过一部《中国死亡文化大观》。我拜读之后曾向郑师提过一个问题：书中的个案，非此家即彼家，绝少平凡人物，原因何在？郑师的回答是：哲学研究总要选取一些经典的例证，既方便展开论证，又可以更好地启人心智。时过六七年，话犹在耳。

其实不仅哲学研究，“经典论”的使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就我们将要展开的话题而言，尽管拥有经典人生的经典人物未必一定有经典的死亡，但确有不少经典人物由于自己堪称经典的“非正常死亡”而成就了自己的经典人生。中国古代的文人，尤其不乏其例。

如果给中国古代的文学家、思想家、书画家等等诸家搞一个高寿善终排行榜，一流的大家不能说榜上无名，亦属凤毛麟角。这确是一个非常有趣而又耐人寻味的现象。我们不能假设他们活到高寿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正如不能假设他们高寿的话会遭遇江郎才尽的尴尬。毕竟，生命的历程是不可逆转、拒绝想像的。甚至，生与死的权利往往不能由本人操纵，有义无反顾自行赴死的，也有被外力强行终止生存权利的，还有令人匪夷所思的意外致死的。无论怎样，这些经典人物的非正常死亡是令人目眩神驰的。从这样一个角度，通过对他们的死亡——生命历程的分析和探讨，应该能够让生活在现代、对这些古人有浓厚兴趣、对生死有热切关注的人们更好地去接近、去倾听、去感悟，这些经典人物和他们的生生死死。

下面交代一下本书的写作。

“同情的理解”是对待历史当有的基本态度，对待这些古人的死，当然不应例外，正因为此，我们放弃了对他们不负责任的调侃。

嬉怒笑骂皆可成文章，自然是没错的。时下，口无遮拦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宽容。或者应该更准确地说，人们的兴趣被极大限度地分化，愿意听或者能够听到我们大放厥辞的人呈总量下降趋势，再加上没多少人愿意拿出他宝贵的时间来较真儿，所以，我们尽可以痛快地大说特说，不必关心别人喝不喝彩，或者理不理睬。但是，有一点还是要很留些小心，现在的人是不能轻易去花哨的，否则有被告侵犯名誉权的危

险。除非你想从这种口水官司中得到些什么。于是我们闲不住的大嘴就肆无忌惮地伸向了古人。一如我们可以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大量地翻印他们的作品,在往自己腰包里装钞票时用不着去考虑讨厌的版税问题,我们也可以随便地抓取他们的生活点滴敷衍成香艳风流的作风故事,在满足自己和大众的窥淫欲时,不用担心他们吹胡子瞪眼不依不饶。在这个浮躁的社会,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世上还有两个字,还需要这两个字,就是:认真。

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证明小书就是严肃认真的精雕细琢之作。我们只是尽可能地审慎一些,让自己的想像建筑在相对坚实可靠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之上。

为了避免断章取义、随意发挥带来的理解错误,我们重视这些古人生平的解读,更注意事件因果的分析。熟悉文学史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书中的有些文字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我和你们接受的这些知识是相同的。书中还很仔细地选用了这些人物的代表作品,有些采用了白话,有些使用原文,求达意而已。从他们的死回观这些作品,品味其中或深或浅的意义,绝不是多余。他们的手写出的是他们的心,“当下此刻”(对我们来说是不可复返的“彼刻”了)的心,这是无法取代的。我们希望利用这些可贵又可靠的文字材料,尽可能完整地勾勒出这些人物的生死历程。

当然,由于认识理解的深度和资料掌握的程度各不相同,不能说每一篇都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最大的希望是,大致搭起一个可以由死观生的瞭望平台,做一点传统审视角度之外的拓展,给还没有忘记关心自己精神生活的朋友多一个选择。

是自作多情吧?问我,问你。

目 录

前 言	(3)
屈原之死	(1)
韩非之死	(11)
李斯之死	(19)
贾谊之死	(31)
司马迁之死	(41)
班固之死	(53)
蔡邕之死	(61)
嵇康之死	(75)
谢灵运之死	(87)
王勃之死	(97)
颜真卿之死	(105)
李后主之死	(115)
李贽之死	(129)
金圣叹之死	(145)
龚自珍之死	(161)
王国维之死	(175)
后 记	(197)

屈原之死

死亡档案

死者姓名:屈原

死者享年:60 余岁(有
其他说法)

死亡时间:五月初五

死亡地点:湖南汨罗

死亡方式:投水自尽

死亡原因:殉国、殉道、
洁身、救主
多种说法

屈原,名平,字原,楚国贵族。早年受怀王信任,为左徒。主张制定法纪,选用贤能,联齐抗秦。受贵族排挤不被重用,被流放汉北、江南,最后自沉汨罗江。作品有《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屈原作品句式长短参差,比《诗经》四字句更富有表现力,形成独特的诗体,后人称之为“楚辞”,又称为“骚体”。



追随先贤投水而去的屈原也许料不到自己会成为后人眼里的先贤、心中的英雄和行动上的追随榜样,他的死和他的作品、他的精神一样,光耀千古

屈原把目光从渐行渐远的那一叶小舟上收回，渔父的身影已经模糊，沧浪歌的余音还未飘尽：“沧浪之水清兮，可以用来洗我的帽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用来洗我的双脚……”

人果真可以这样适性顺情吗？屈原不能理解；渔父临去的那莞尔一笑，也让他很是疑惑：那笑容后面是一种超脱尘世的潇洒和自由，不也是自己的追求吗？可我们为什么话不投机？故楚旧地的一个渔父都能认出我来，对我表示关心，我的回答是否过于傲慢——“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渔父的劝导之辞脏了我的耳朵吗——“圣人是能够不拘泥于外物，随世道变化的。世上的人都混浊，难道自己不能随波逐流？世上的人都喝醉了，难道不能自己也来上几口？为什么非要自命不凡、不同俗流？落到现在的地步，岂不是自作自受吗？”我的辩解没有力量吗——“刚刚洗过头，一定会弹一弹帽子的灰尘；刚刚洗过澡，也准会抖一抖衣上的浮土，这是人之常情。谁能会以洁净之躯赴污浊之地？谁又能以一身清白被蒙上层层尘垢？”听了我的回答，渔父竟鼓枻而去。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也罢了。可他为什么又要唱沧浪歌呢？他的歌声还算动听，行为却着实有些古怪。

想到这里，屈原不禁苦笑：我在世人眼里不也是古怪的吗？为什么我要一再地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意？我要证明什么？死，真的一种无法摆脱的诱惑吗？那就死好了！

屈原为自己的决定而渐渐平静——楚国的王公大臣，是没指望的；楚王，也没指望；楚国，已日没西山，不可收拾；屈原不才，壮志雄心，却无从施展，还被贬官流放——自己也是没指望的了。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留恋牵挂？屈原不再想了。

再写点什么吧，对自己的生命有个交待：

陶陶孟夏兮(和熙温暖的初夏)，

草木莽莽(草木繁茂生长)。

伤怀永哀兮(内心久久哀伤)，

汨徂南土(独行在故国南方)。

陶兮窈窕(回顾大地苍茫),
孔静幽墨(寂静没有音声)。
冤结纆轸兮(心里郁结悲痛),
离愍之长鞠(身遭忧患长处穷困)。

.....

惩违改忿兮(放弃仇恨改变怨忿),
抑心而自强(锻炼心志自强不息)。
离潜而不迁兮(遭受忧患而不改其志),
愿志之有象(要给后人作出榜样)。
进路北次兮(加快赶路往北停宿),
日昧昧其将暮(太阳快要落山了)。
含忧虞哀兮(舒解忧愁排遣哀苦),
限之以大故(真正解脱只一死)。
乱曰:

.....

世溷不吾知(世人混浊不了解我),
心不可谓兮(人心难以沟通)。
知死不可让兮(既知死是不可回避的),
愿勿爱兮(就不要吝惜生命)。
明以告君子兮(明白地告诉前贤君子),
吾将以为类兮(我和你们是同类)。

写完这篇被司马迁称为“怀沙之赋”的绝命辞,扶一扶自己崔嵬高耸的切云冠,抖了抖“披明月兮佩宝璐”的长衣,陆离长铗还悬在腰中——莫与争锋的宝剑终归只能成为佩物,难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了,屈原走到江边,俯下身去——江水荡漾,映出的那个“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老头儿是当初意气风发、内政外交样样精通的左徒大人吗?屈原已无暇再作什么感慨,他抱起一块分量相当不轻的石头,纵身一跃……

水花翻起之处,楚国——崛起于南土,筚路蓝缕开创基业,称霸诸侯数百年的泱泱大国——的最后一位人杰在世间从此消失。这一天,是夏历的五月初五。

屈原,被公认为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山祖师,在中国非正常死亡

的文人当中,他也是排在首位的一流大家。

关于屈原的死亡,投水是众无异辞的方式,至于赴死原因,就颇具争议了。有一则来自屈原故里湖北秭归乐平里的民间传说是这样讲的:

相传屈原遭奸佞中伤后,被楚怀王流放到沅湘荒蛮之地,怀王在秦国死后,顷襄王继位。当时的楚官已堕落得不成样子,秦军经常犯楚,占领了楚国不少地方,后来又攻破了郢都,并追杀顷襄王。顷襄王非常悔恨,当初不该亲秦,更不甘心楚国近800年的基业毁于自己手中,于是他想到了被流放在汨罗江一带的屈原,就去找他商议救国的大计……秦军闻讯后紧紧追来。在这危急的关头,屈原与楚王换了衣服,并在秦军的视线下跳进了汨罗江。秦军眼看着“顷襄王”沉下去后,停止了追杀,使顷襄王逃脱了。此后,顷襄王聚集残兵,收复失地,继续抗秦,使楚国的历史又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这则民间传说和楚史不尽相合,它认为,屈原投江不是悲观绝望,而是为了“救主”,和以往的各种分析均大相径庭,令人耳目一新。反映了民间百姓对屈原的强烈的热爱和特殊的理解。

关于屈原之死的理解,传统看法主要有“洁身说”,即“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殉国说”,即“不忍见其宗国将遂危亡”;“殉道说”,即为理想“美政”信念破灭而死;“尸谏说”,即以死诤谏等等,每一说都有屈原作品作为推断依据,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从屈原绝命辞入手,做一点具体分析。

在屈原的众多作品中,死亡,尤其是投水而死的描写很突出。从这些作于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屈原对死有着很深入的认识,他的赴死行为也是累积的,不是一时想不开的偶然愤激之举。中国有句老话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么,从绝命辞这一距离生命结束时间最近的“善言”是可以看出屈原临死的心境和心态的。当然,我们不必天真到认为绝命辞一定是死前那一刻所作。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认为“怀沙之赋”是屈原的绝笔,是看到了其中有必死之心,后人就解释“怀沙”即“抱石”之意。其实,“沙”指的是长

沙,“曰‘怀沙’者,盖寓怀其地,欲往而就死耳。”之所以要往长沙就死,是因为长沙是楚始祖生息发祥之地,死要死在祖先旧地,有狐死首丘的意思。《怀沙》中有“进路北次”的话,亦可见不是临死所作。

《悲回风》也被有些学者认为是绝命之辞,宋代朱熹认为屈原此时“身已临沅湘之渊,而命在晷刻矣”,清代王夫之更认为《悲回风》“盖原自沉时永诀之辞也”。诗中的情感悲愤已极,并特别举出被吴王夫差赐死、尸弃大江的忠臣伍子胥和商末因忠谏不被纣王所纳而抱石自沉的贤臣申徒狄,不无同情与敬佩,这也是有些学者认为屈原死因是以死谏的一个依据。但从诗中末句的抉择不定的矛盾心态看,虽然屈原对生命已没有什么个人的依恋,却又不愿像申徒狄一样死得于事无补,似乎距离投江赴死还有一段时间。

《惜往日》是现在被多数学者接受的屈原绝命辞,诗中写道:

临沅湘之玄渊兮(面临沅湘无底深渊),
遂自忍而沉流(我要忍心跳水自沉)。
卒没身而绝名兮(身死名灭又有何妨),
惜壅君之不昭(可惜雍君永受蒙蔽)。
.....

宁溘死而流亡兮(宁愿暴死尸随水流),
恐祸殃之有再(惟恐祸殃再来降临)。
不毕辞而赴渊兮(话没说完就跳进江水),
惜雍君之不识(痛惜雍君不识我心)。

在屈原其他作品中,对楚王的称呼有多种,却极少贬意,此篇则直呼为“雍君”,可见屈原的痛心疾首和义无反顾。把《惜往日》定为绝命辞,从情理上应更可信。从诗中可以看出,它既有对个人命运的哀叹,也有对楚国命运的哀叹。由于各人理解的角度不同,遂造成了“殉国”、“殉道”、“尸谏”、“洁身”诸说并存,其实诸说并非判然有别,是可互通的。

屈原喜欢戴高耸的帽子，在他头上众多“第一”的帽子中，有一顶上面写着“谜”。由于年代久远，历史又丢三拉四，屈原身上笼罩的厚厚的谜团，也称得上独一无二。死亡原因、死亡时间、埋在哪里，这些巨大的问号让后人用了几个千年的时间，至今还无法完全拉直。

五月初五是为大众广知的屈原投江日，但具体是在哪一年？史无记载。在没有地下文物这一铁证的情况下，各种推断都不能落实，大体在楚郢都被秦攻破（公元前 278 年）后这种说法是得到认同最多的，但终究无法定论。

屈原的葬地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屈原的遗骸沉在江底无从寻找；有传说屈原安葬在汨罗山上；还有人认为屈原的遗体被运回郢都安葬，前几年因出土竹简《老子》而声名大噪的郭店楚墓的墓主就是屈原。

屈原既被后人赞为“千古第一人”，人们对他的热爱就不会不强烈，这么多的解释层出不穷，也是屈原魅力的一个表现吧。

人的一生是由起点到终点的一段时间历程。屈原的终点留下的是后人猜测不尽的谜，他的人生起点也同样神秘难测。

关于屈原的生年，现存惟一的依据是屈原抒情长诗《离骚》的开端自述：

帝高阳之苗裔兮（我是古帝高阳后裔），
朕皇考曰伯庸（父亲的名字叫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正当寅年寅月），
惟庚寅吾以降（我在庚寅日降生）。

据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的注解，“摄提”即“摄提格”，指太岁在寅之年，“孟陬”指正月初春，正月又称寅月，即建寅之月。所以屈原出生的时间是太岁在寅之年的寅月庚寅日，即寅年寅月寅日生。这在当时人看来，是大吉大利的好日子，所以《离骚》接着说：

皇览揆余初度兮（先父研究了我的生日），

肇锡余以嘉名(便赐给我美名)。
名余曰正则兮(给我命名叫正则),
字余曰灵均(给我取字叫灵均)。

对这个新降生的婴儿寄予了莫大的期望。

虽然通过作品分析作者生平有一定的风险——我们没有办法对作品的纪实程度进行鉴定和打分,尤其是抒情性很强的长诗《离骚》,诗作中的艺术形象“吾”,与历史实在的屈原之间有没有一定的距离,也很难说——但这条珍贵到惟一的线索还是给了我们一窥究竟的希望,至今还未见有谁放弃对它的采信和使用。寅年寅月寅日生是大家的共识,但因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古代历法,所以后人的推算结果也多种多样,据学者统计在10种以上,很难说哪一种说法绝对正确。

即使如此,屈原的生平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出来的。

屈原的诞生地是楚国秭归乐平里。秭归原名丹阳,濒临长江,靠近三峡,是一个嶂叠山青、绿水萦回、风景秀丽的灵异之地。

屈原的家庭属于王室宗族,这种家庭环境自然要培养未来的官吏,屈原也颇有进取之心,他遍览古籍,并留意历代兴亡盛衰之迹,希望自己能像商代伊尹辅佐商汤、像周代吕望辅佐周武王那样,将来辅佐楚王振兴楚国、统一天下。

屈原在政坛上的辉煌是在楚怀王登基以后。怀王早年也励精图志,有称霸之心。年轻的屈原被任命为三闾大夫。职责是掌管屈、景、昭三姓贵族子弟的教育,担当着为楚国培养人才的重任。屈原在任十年,忠于职守,不遗余力。约当怀王十年(公元前317年),屈原被任命为左徒,参议国事,地位仅次于令尹。

屈原在此时可谓意气风发,《史记》说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可以说,在楚怀王的支持下,屈原的内政外交工作都搞得不错。他根据当时形势,力主联齐抗秦,并出使齐国,与齐国签订了盟约。

屈原的风头出得太大,免不了遭到同僚的嫉妒。偏偏屈原又是一个以清高自命但很缺乏政治手段的官员。他倚仗怀王的支持,对群僚的侧目毫不理睬。他很快就摔跤了,而且摔得很重。

屈原的同僚上官大夫听说屈原从怀王那里接受旨令,秘密起草扩

大改革的具体措施,他要求屈原给他看看草稿,遭到屈原的拒绝。恼羞成怒的上官大夫向怀王进谗言,说朝廷每次颁布政令,屈原都到处宣扬这是他自己的功劳。好大喜功、轻信易怒的怀王听信了上官大夫的话,开始疏远屈原,不许他上朝议事。屈原被排挤出了决策层。屈原对怀王的中道改志十分震惊,他多次请求怀王继续改革,但怀王不予理睬。同历史上其他许多改革家一样,失去王权支持的屈原,已无回天之力,富国强兵的改革中途流产。

屈原失去了官职,而此时的楚国,也在渐渐失去称霸的资本。

在与强秦的较量中,楚国处处落在下风。最终,怀王被骗入秦,客死秦国。继位的项襄王平庸无能,他还免去屈原三闾大夫的职位,将他逐出郢都,流放到江南湘西一带的荒野。

接下来的故事对于曾经“居庙堂之高”的政治家屈原就简单多了,“处江湖之远”的流放生涯使他饱览了楚国的山河之美和南湖的巫风之烈,这些,并没能抚慰他受伤的心灵。秦国的虎狼之师屡屡进犯,楚国的大好江山日益凋蔽。当怨恨不断积累,积累到了绝望之时,他决心一死。

三

屈原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以《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最为著名。他的诗歌有浓郁的南楚色彩,被后人称为“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广为人知,其中抒情长诗《离骚》受到了最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和关注。

《离骚》一题的释义,说法很多,有说“离骚”是“遇愁”的,有说“离骚”是“忧愁”的,有认为“离骚”是乐曲名“劳商”的音转,有认为“离骚”是“牢骚”,还有把“离骚”解释为“离别之愁”的。总之,是屈原“不平而鸣”之作。

《离骚》全篇 368 句,近 2500 字,是屈原用激情、热血以致生命熔铸的伟大诗作。它不仅是屈原社会理想和心路历程的全面展示,更开创了我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之源,具有令人目眩的艺术魅力。诗中“香草美人”已凝聚为中国诗歌固定的象征系统,而“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

之所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等脍炙人口的诗句，已经成为众多有志者的座右之铭。

说起屈原之死对后世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是他对后世历代文人的影响，即精英文化层面的影响。

屈原爱国爱民的思想、清廉正直的品行、为坚持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一直在感召着后世的进步文人为保卫祖国、抵御侵略、反对压迫和剥削、反对黑暗和邪恶、追求光明和正义进行顽强的斗争，也一直鼓舞着人们清廉自守、追求个人的人格价值。每当民族危亡、政治黑暗、社会混乱的时代，人们总是记起屈原，从他的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淮南王刘安《离骚传》说：“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污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皜然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精神如同日月一样照耀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对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贾谊、司马迁、李白、杜甫、柳宗元、苏轼、刘克庄、文天祥、顾炎武、谭嗣同、秋瑾、鲁迅、郭沫若，可以说，历代忠心为国、敢赴国难的志士，都取屈原为榜样，他们从屈原身上汲取并践行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

另一方面是屈原对民间文化的影响，这一影响既深且广，没有任何其他一位文人能够望屈原之项背——他是我们全民族惟一至今仍用传统节日来纪念的伟人。

屈原五月五日的投江导致了我国极其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此以后，五月五吃粽子、划龙舟这些有着悠久历史的习俗与屈原有关成了最有影响的说法。

端午节是中国三大佳节之一，在中国传统节日中有几个鲜明的特色：传承时间最长，从先秦沿袭而下，并日趋发展；流行地域最广，凝聚了多民族多地区的文化因子，节日内容日益丰富；活动渊源悠久，为华夏子孙共同关注。

端午节的起源，据闻一多考证，认为是远古吴越民族祭祀图腾——龙——的活动日，其活动的主要形式为：将各种食物用树叶包裹，扔向水里给蛟龙享受，并在急鼓中划着刻画着龙形的独木舟在水上竞渡，后来，这些原始的祭仪逐渐演变为端午节的两大节俗：包粽子和赛龙舟。